



我们上观是怎样学大寨的

马 玉 祥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我們上观是怎样学大寨的

马玉祥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66年·沈阳

出版者的話

上观大队是我省学习大寨的一个好典型，这个大队的党支部，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省委农村支部工作会议上，受到了重点表扬。

上观大队学习大寨，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做出很大成绩呢？其根本原因，是党支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突出政治，实现了领导思想革命化。他们学大寨，是大学，不是小学；是真学，不是假学，而且他们把学大寨，是当做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来进行的。在学习过程中，他们认真地读了毛主席的书，用“一分为二”的观点，对照大寨人的革命精神，总结了过去的工作，承认了天外有天，找到了差距，放下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包袱，丢掉了中游思想和畏难情绪，下定了彻底革命的决心，树立了为革命、为人民的思想。因而，他们能够发动群众，说干就干，雷厉风行，立竿见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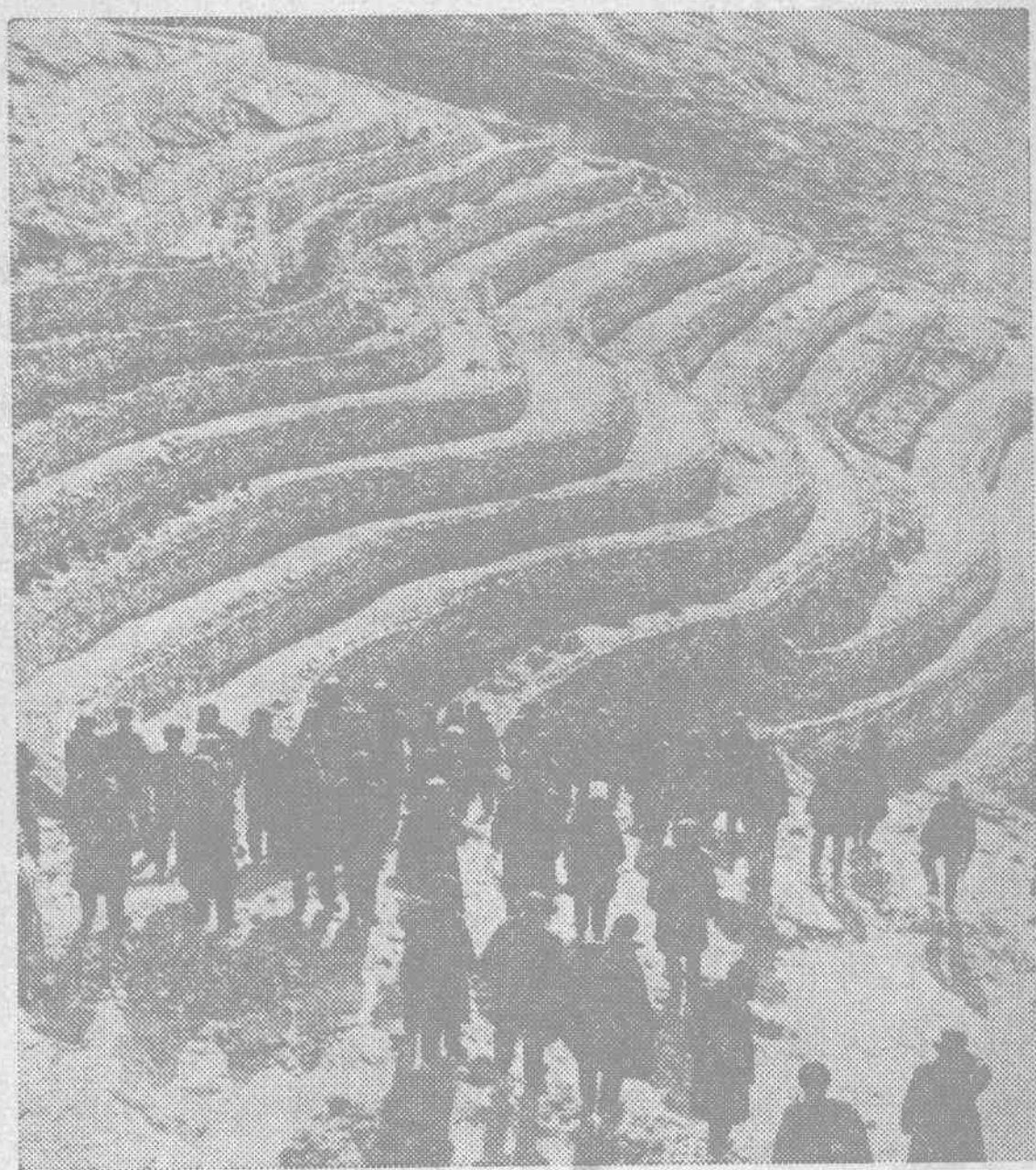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证明：我们党支部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突出政治，实现领导思想革命化，又能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把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发挥出来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，任何奇迹也能创造出来，学大寨也可以立见功效。这一点，上观大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因此，我们殷切地希望每一个共产党员，革命干部都来认真读读这篇文章，并问一下自己：今后将怎样革命，也象上观大队的同志那样，带着阶级感情，活学活用一辈子《为人民服务》，活学活用一辈子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！

我是北鎮县常兴公社上观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我叫馬玉祥。我現在就把我們大队是怎样学大寨的，向同志們汇报一下。

八十八天的变化

我們上观大队，在医巫閭山根儿底下。山多地少，坏地多，好地少，全大队一千六百零一口人，四千多亩地，去了一多半果园，純粮谷作物面积每人只有八分多地（包括果粮間作面积每人三亩多）。有些山地，因为土薄，社員都管它叫干豆腐地。山大树少，老树多，小树，少，沟大缺柴，有河沒有长流水。十年九旱，一旱三千：河干、井干、苗干。解放前是个穷山沟，解放后十几年来，虽然生产有了些发展，但还一直是个缺粮戶。

我們大队，打去年秋天起，可发生了大变化。我們全民动員，彻底革命，在山坡上大修



上观大队新修的梯田，吸引了許多参观的人們
梯田，向秃山进軍，在石砬子上造地。前后八
十八天的工夫，除了及时完成秋收任务，翻了

两千多亩地以外，还治了两沟五岭十九坡，全大队的一千一百多亩坡耕地和一千三百多亩坡耕果园，基本上实现了梯田化，另外还开山造地一百零五亩。造地和开沟的石方达一万六千五百立米，挖运土方四万九千多立米；在河滩地开荒四十八亩，造林二百二十亩。其中有些治山工程是很艰巨的。在肋岔沟基本修成的那八十亩水平梯田，原来从上到下一色是大石头。在这上边砌了一到二米高的石坝二百零三道，长的六百米，短的二十米，连在一起有二十二华里长，治一沟成一沟，治一坡成一坡，边治沟边栽树，沟坡兼治，工程配套。兴修这些工程，我们没有放一炮，完全是凭两只手干起来的。这八十八天兴建的工程，比一九五六年以来兴修的工程总数还多四倍。不仅山区面貌改变了，人的精神面貌也大变样了，这是我们过去不敢想、不敢干，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。

人还是上观大队的人，地还是上观大队的地，山还是上观大队的山，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？这就是因为我们读了毛主席的书，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放下

了驕傲自滿的思想包袱，真心實意學習大寨革命精神的結果。

當十八年幹部，為人民干了什麼？

原來，我們大隊帶帶拉拉地也搞了一些山區建設工程，農業生產也有了一些發展。解放前糧食畝產一百五六十斤，去年達到三百七十八斤。去年梨果是個小年，又遭了風雹災，還摘了二百萬斤，比解放前的大年產量提高一倍以上。有時候受表揚，就覺得我們已經干得不錯了。又覺得，我們每年平均賣給國家二百五十萬斤梨果，貢獻不小，吃點國家糧也是應該應份的，吃的还挺硬氣。因為有這種自滿思想，就不想向前發展了。一提起學習外地經驗，我們就不服氣，認為沒啥可學的。就是這種思想，擋住了我們的眼睛，絆住了我們的腿腳。

去年秋收前，我參加錦州市委召開的農村三級幹部會議，會前說先出去參觀。我問公社黨委副書記孟昭林同志：“上哪參觀？”孟昭林同志說：“上興城縣古道子生產隊、綏中縣

上荆大队。”我想：古道子、上荆，好也好不了哪去，不跟去大寨解渴。可是，到了古道子和上荆那一看，有点服气了。古道子生产队开了八百多道谷坊，一道谷坊上边是一片苞米，一年能收一万四千多斤。一想我们大队呢，以前搞了两千八百多座谷坊，一粒苞米也没有种。上荆大队一九五三年栽的苹果树，苹果结的噹哩嘟噜的。我们一九五二年栽的那一万八千棵苹果树，别说结果，树都快糟踏光了。我当时想，还用上大寨干啥，这两个地方就够我们学一气的了，回去老老实实干吧！过些日子，我又随北镇县委组织的参观团到关内参观。先到了河北省的沙石峪，以后又到山西的大寨，这下子更开了眼界，更知道天外有天了。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，过去连一亩平地都没有，现在呢，从山下到山上都修起了水平梯田，平平整整，庄稼长的黑绿黑绿的，山上的庄稼比我们平地的都强，每亩地打七八百斤。我一看，真了不得，可别不服气啦。

我们和大寨比起来，沟没人家的深，坡没人家的陡，条件比人家好的多，可是治山工程

比人家数量少，质量差的多，粮食产量比人家低。大寨粮食不但自给了，还卖给国家很多，对国家有很大贡献，可我们总是伸手向国家要粮吃。大寨从一九五三年搞山区建设，十几年一气干到底，千难万难，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也沒打折回。我们呢，从一九五六年治山以来，十年里，三起三落，上级抓就搞，不抓就不搞，县委和公社党委几个会不提倡就拉倒了，沒有人家大寨那样革命到底的决心。我想：我当了十八年的干部，为人民干了什么呢？上观大队缺粮吃的問題都沒解决，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？叫产粮队养活着，这叫什么自力更生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上观的面貌，哪象个艰苦奋斗的样子？和大寨比一比，最大的差距，就是我们上观大队的领导干部，缺乏大寨人的革命精神。人家陈永贵是胸怀祖国，眼望世界，我呢，是豆腐一方，扁担一条，胸怀自己，眼望上观。领导上要领导群众革命，非得先从支部领导上树立革命思想不可。想到这些，我出了一身汗，一連几宿也睡不着觉。寻思啥呢？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上观人民哪！我是

苦大仇深的人，上半輩子是苦上加苦，八個月沒爹，十二個月沒有媽，打八歲起就扛小活，一直扛到三十五歲。共產黨要不來，到現在我還得扛活。老啦，地主可不管你老不老，還得讓你給他賣命，累死拉倒。從打解放那一天起，我就參加了革命。這麼長的時間，和陳永貴一樣，都是在黨和毛主席的教導下干革命的，可我沒給革命做出什麼貢獻。當了這麼多年幹部，上觀大隊缺糧戶的帽子還沒摘掉，年年得向國家要二十萬斤糧食。運糧的車工、人工和糧錢加一起得兩萬多元。國家正在搞建設，還要支援世界人民革命，我們對國家不但沒有貢獻，還給國家增加負擔，我這十多年的工作是怎么搞的呢？越琢磨越難受，難受的我腦袋都脹乎乎的，恨不得一步跑回家去和群眾大干一場。

支委決心學“愚公”

從大寨參觀回來，當天晚上我和幾名支委碰了頭，就開了支委會。我們黨支部八名支委，年齡都很大了。大隊長陳福元四十八歲

了，还算是个小伙。我五十六岁了，最大的是六十二岁，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，只有妇女大队长二十八岁，是年轻的。平素日我們沒有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，这是个缺点。支委会上，我先把参观大寨的情况介紹一下，又学了一段毛主席著作。

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我过去自己认为沒有文化，学不进去也就不爱学了。去年有一天，我們县的王县长来了。他說：“老馬，你得学习毛主席著作呀！”我說：“文化低，有困难哪。”他說：“你还是不钻哪，我告訴你个办法，你看不太懂，可以听，別人学习，你就跟他們一块儿听，一块儿看，一块儿討論。你不是会分析嗎？”我說：“那我会呀！”我就用这个办法，和大家一起学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們每次开会都先学一段毛主席著作。这次会上我們学的是《愚公移山》。我說：

“咱們都是老粗，学毛主席著作靠耳朵听，要象听大鼓书似的，听完就忘了，那就白学了。学《愚公移山》要抓住啥呢？要記住毛主席教导我們的坚持革命的精神。我們以前治山三起

三落，就是缺乏这种坚持精神。老愚公和他的儿子、孙子加在一起，也只是几个人，就敢把門前两座大山搬走。我們大队七百多劳动力，又有党的领导，强于他們百倍。我們这几座山也不用搬，修还不能把它修好嗎？”接着就让大家討論学习大寨、修山治山、实现粮食自給的問題。一上手，都不吱声，悶了一气才說話了。六十二岁的老支委李坤說：“大寨的經驗好是好，按理說，咱們也应该学。可实不相瞞，我是信心不太大。象我这样土埋半截的人，說也說不动，做也做不动，鷹嘴鴨子巴掌——能吃不能拿了，还领导誰去？咱們把現有的果树园子整整，把地好好蒔弄蒔弄也就行了。”有的支委接着說：“我看也是，整不好还落一身不是。大寨搞到这个样，不是一日之功，人家干十多年了，咱們要赶大寨，別說走哇，坐飞机也攆不上。”支委、大队长陈福元却說：“不能那么讲，就看干不干，要干就能攆上。大寨治山这些年，也走过不少弯路。咱們有治山基础，有从外地学来的先进經驗，可以少走些弯路，还可以更快一些。”支委、

妇女大队长李紹珍說：“不管咋說，人家大寨是土山多，咱这山都是石头砬子，怎么个掘法？”我和大家說，大寨有土山也有石山，条件不如上观，靠的是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”八个大字，凭的是两手双肩一把鎬，苦干实干創下的家业。我們共產黨員，要想給人民办点好事情，把上观变个样，就不能总拉借口，找台阶下，先要拍胸脯想想，咱有沒有大寨人那样的革命志气。头一天这个会沒叫起座来，我說完了，老李坤也睡着了。完了，我又跟支委、大队长陈福元商量：“会沒开好，怎么办哪？”陈福元說：“还开呀，明天上山开去，开个支委扩大会！”我說：“对！明天上山开会还是先学习。”陈福元說：“还学习啥呢？”我說：“学《紀念白求恩》。”

第二天，支委扩大会一开始，結合学习白求恩，我先做了檢查。我說：“毛主席教导我們，每一个共產黨員都要象白求恩那样，为革命献出一切，不抱一丁点私心。我呢，从斗地主到現在，当了十八年干部，沒給党和上观人民做出什么貢獻，遇事不是干字当头，是怕字

当头，和白求恩相比，这算是什么共产党员呢？咱们大队多少年没有解决的缺粮问题，应该解决了。要是能够实现粮食自给，每年就能为全大队社员省下两万多元的购粮钱；就能少向国家要二十万斤粮，这也就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，支援世界革命。咱们都应该想一想，咱这后半辈子应当怎样革命，能够给后代留下些什么？大家说说，咱们上观敢不敢下一个决心解决它？”老支委陈福祯从一九六四年就领八个社员上山造地，成绩不小，社员也都拥护他，管他叫“老坚决”。当时他激动地说：

“敢！你别看我五十七了，可是我还不服老，共产党员只要有三寸气在，就要革命。在上观不打了个粮食翻身仗，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！”老李坤在旧社会也是个苦大仇深的人，十四岁死了母亲，就跟着父亲出外要饭，以后又给地主扛活，累的死来活去，一提起这个他就掉泪。第一次支委会上，他说了几句泄气话，晚上回去躺在炕上一宿没合眼，怎么寻思怎么觉得不对劲，今天他听了《纪念白求恩》这篇文章，就更坐不住了。他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，

站起来說：“人家白求恩是外国人，还大老远地跑来帮助中国鬧革命，我是中国人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，是上观大队的干部，給本队社員服务，还要抱老退坡，真不象个共产党员了！今后一定要学习白求恩的革命精神，支部叫我干啥就尽我的力气干，不但我干，还叫我两个儿子为革命出力。”我們八个支委都是貧雇农，在旧社会都受过不少苦，就是二十八岁的妇女大队长李紹珍，也是到六七岁了才得好。想想过去苦，看看今日甜，拿自己的思想，和毛主席的教导一对照，这脑袋就嗡嗡地发脹。这些天来，經過反复学习、討論、檢查、对照，大多数人認識到：那种驕傲自滿，害怕困难，甘居中游的思想情緒，再也不能跟它“和平共处”了，非大干它一場不可。那么来了这股子勁以后，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呢？沒有，在討論粮食自給的时候，还有的支委对到底能不能很快实现粮食自給信心不大，只提“力爭”，不敢提“保证”，陈福元很不同意地說：“以往哪年都說‘力爭’，实际一干，就图省事、怕費勁。不能再提‘力爭’了！要

是給自己留后門，結果就要見硬就回，一拉松，‘力爭’成了不爭；这回要干，咱就徹底點，把‘力爭’摳去，換上‘堅決’！”大伙說：“對！”半天沒發言的曹百祥又冒出一句話：“咱們喊自給倒容易，若是自給不了，國家還給不給？”支委們都說話了：“咱們喊自給，就得苦干实干，堅決做到！”大多數同志的思想認識提高了以後，也就找出了許多保證實現糧食自給的有利條件和措施。

支委、干部下定決心以後，在黨員大會上，我們又反復學習了《將革命進行到底》《為人民服務》《愚公移山》《反對自由主義》等文章，我們着重學習了《將革命進行到底》。大隊長陳福元問：“為什麼要學這篇呢？”我說：“我們上觀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治山，治到現在沒治成，這算革命到底嗎？”在這次會上，我們大講自力更生、艱苦奮鬥的大寨精神，講大寨對國家的貢獻。三十二名黨員普遍受到很大教育。一隊的黨員、隊長符寶良說：“大寨的成績再大也是人干出來的，我們要實現糧食自給的任務再艱巨，還能有上前方殺敵艱巨嗎？我參